

高阳著

一代巨賈

胡雪巖





2 034 9000 7

高
阳
著

一代巨贾

浙江
文艺
出版
社



封面设计 杨 光

一代巨贾

(上下册)

高 阳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二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8.375 插页4 字数891,000 印数00,001—25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·322 定 价: 6.00 元

出版前言

胡雪岩（1823——1885），清末大资本家。初年在杭州设银号，经理官库银务。1861年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杭州清军，被太平军击退。次年又为清军勾结法国侵略者组织“常捷军”。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，又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，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，代借内外债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两。他依仗湘军权势，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，在杭州开设庆余堂药店，并经营出口丝业。1884年受洋商排挤破产。

台湾省作家高阳的这部长篇小说，主要描写胡雪岩从一个被钱庄开除的小伙计始，际会风云，处心积虑屡施奇计，收服了高官显宦、落拓文人、流氓妓女和太平军叛徒等三教九流各种人物，从而周旋于官府、帮会、中外商贾之间，出入于官衙、商行、青楼、赌场之地，白手起家，买空卖空，终于成为一代巨贾这极富传奇色彩的发家史。

小说内容丰富，文字精炼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情节曲折，把清末社会的人情世态、官场内幕刻划得淋漓尽致；对于读者认识晚清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制度、阶级矛盾、官僚资本家发家的奥秘等等，不无裨益。至于小说对一些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的评述、描写和历史用语等等，也还有可商榷之处。

本书原名《胡雪岩》，考虑到今天的读者中知道胡雪岩其人的不多，故这次出版时更为现名，并对原书作了文字上的校订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601-3/20

楔 子

在清朝咸丰七年，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，全国金融事业，为两个集团所掌握；商业上的术语称为“帮”，北方是山西帮，南方是宁绍帮；所业虽同，其名则异，大致前者称为“票号”，后者称是“钱庄”。

山西帮又分为祁、太、平三帮，祁县、太谷、平遥；而始创票号者，为平遥人雷履泰。他最初受雇于同县李姓，在天津主持一家颜料铺，招牌叫做“日升昌”，其时大约在乾隆末年。日升昌在雷履泰的悉心照料之下，营业日盛，声誉日起，连四川都知道这块“金字招牌”；因为雷履泰经常入川采购铜绿等颜料，信用极好。

四川与他省的交通最不便，出川入川携带大批现金，不但麻烦，而且有风险。于是雷履泰创行汇兑法；由日升昌收银出票，凭票到指定地点的联号兑取现银。当然，汇兑要收汇费，名为“汇水”；汇水并无定额，是根据三个因素计算出来的：第一、路途的远近，远则贵，近则廉。第二、银根的松紧，大致由小地方汇到大地方来得便宜，由大地方汇到小地方来得贵，因为地方大则银根松，地方小则银根紧；如某处缺乏现金，而有待兑的汇票，则此时有客户交汇，正好汇急，反有倒过来贴补客户汇费的。

最后是计算银锭的成色银锭的大小，通常分为三种，最大

的五十两，为了便于双手携捧，做成两头翘起的马蹄式，即所谓“元宝”，而出于各省藩库的，称为“官宝”；其次是中锭，重十两，有元宝形的，称为“小元宝”，但通常都做成秤锤式；最小的或三两、或五两，通称“银铤”。再就是碎银，轻重不等。此外各省有其特殊的形制，如江浙称为“元丝”，底凹上凸，以便叠置。但不管任何形状、大小；银子的成色，各地不同，需要在交汇时核算扣足。

由于汇兑凭票兑银，所以叫做“票号”。早先运送现银的方法，如果不是随身携带，就得交镖局保送；费用大，麻烦多，走得慢，而且还有风险，万一被劫或者出了其他意外，镖局虽然照赔，但总是件不愉快的事，所以票号一出，请教走镖英雄好汉的人就少了。

早期的票号，多为大商号兼营的副业，到咸丰初年，始有大量专营的票号出现。但票号的势力不得越长江而南，因为江南的钱庄，为保护本身的利益，一方面仿照票号的成例，开办汇兑业务；一方面力拒票号的侵入。至于票号除汇兑以外，以后亦经营存款及放款；所以票号与钱庄的业务，由于彼此仿效的结果，几乎完全相同，只是在规模上，钱庄逊于票号而已。

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，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。但在同治到光绪初年，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，规模凌驾票号而上之；同时他的主人亦不属于宁绍帮，是为当时金融业中的一个特例。

这家钱庄的字号叫“阜康”，它的主人是杭州人。

有个福州人，名叫王有龄，他的父亲是候补道，分发浙江；在杭州一住数年，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使。老病侵寻，心情抑郁，死在异乡。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，运灵柩回福州，要好一笔盘缠；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，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。

境况不好，而且举目无亲，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；每天在“梅花碑”一家茶店里穷泡；一壶“龙井”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，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，算是一顿。

三十岁的人，潦倒落拓，无精打采，叫人看了起反感；他的架子还大，经常两眼朝天，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。

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，王有龄只知道他叫“小胡”；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，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，而且为人“四海”，所以人缘极好。不过，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，也识不透他的身分；有时很阔气，有时似乎很窘，但不管如何，总是衣衫光鲜——象这初夏的天气，一件细白夏布长衫，浆洗得极其挺括；里面是纺绸小褂裤；脚上白竹布的袜子；玄色贡缎的双梁鞋，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钉的青布长衫一比，小胡真可以说是“公子哥儿”了。

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，王有龄却以自惭形秽，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。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，小胡跟王有龄“拼桌”；

他去下了两盘象棋，笑嘻嘻走回来说：“王有龄，走，走，我请你去‘摆一碗’。”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，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。

“谢谢。不必破费。”

“自有人请客。你看！”他打开手巾包，里面有头二两碎银子；得意地笑道：“第一盘‘双车错’；第二盘‘马后炮’；第三盘，小卒‘逼宫’，杀得路断人稀。不然，我还要赢。”

为了盛情难却，王有龄跟着去了。一路走到“城隍山”——“立马吴山第一峰”的吴山；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，一面喝酒一面闲谈。

酒到半酣，闲话也说得差不多了，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：“王有龄，我有句话，老早想问你了。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；而且我也懂点‘麻衣相法’，看你是大贵之相，何以一天到晚‘解’茶店？”

王有龄摇摇头，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，慢慢咬着；双眼望着远处，是那种说不出的茫然落寞。

“叫我说什么？”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，仿佛要跟他吵架似的，“做生意要本钱，做官也要本钱，没本钱说什么？”

“做官？”小胡大为诧异，“怎么做法？你同我一样，连‘学’都没有‘进’过，是个白丁。哪里来的官做？”

“不可以‘捐班’吗？”

小胡默然。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——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，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，富而不贵，美中不足，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，象扬州的盐商，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，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，平起平坐；否则就不算“缙绅先生”，有事上得公堂，要跪着回话。

再有一种，本是官员家的子弟，书也读得不错，就是运气

不好，三年大比，次次名落孙山，年纪大了，家计也艰窘了，总得想个谋生之道；走的就是“做官”的这条路，改行也无从改起，只好卖田卖地，拜托亲友，凑一笔去捐个官做。象王有龄这样，年纪还轻，应该刻苦用功，从正途上去巴结；不此之图，而况又穷得衣食不周，却痴心妄想去捐班，岂不是没出息？

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，有几杯酒在肚里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，“小胡！”他说，“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信不信由你；先父在日，替我捐过一个‘盐大使’。”

小胡最机警，一看他的神情，就知道决非假话，随即笑道：“唷！失敬，失敬，原来是王老爷。一直连名带姓叫你，不知者不罪。”

“不要挖苦我了！”王有龄苦笑道，“说句实话，除非是你，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；说了反惹人耻笑。”

“我不是笑你。”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，“不过，有一层我不明白，既然你是盐大使；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，为什么不给你补缺？”

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——。”

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，凭一张吏部所发的“执照”，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；如果要想补缺，必得到吏部报到，称为“投供”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。王有龄尚未“投供”，哪里谈得到补缺？

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，王有龄又说：“我所说的要‘本钱’，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。如果境况再宽裕些，我还想‘改捐’。”

“改捐个什么‘班子’？”

“改捐个知县。盐大使正八品，知县正七品，改捐花不了多少钱。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盐大使只管盐场，出息倒也不错，不过没有意思。知县虽小，一县的父母官，能杀人也能活人，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。”

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，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，一扫而空了。

“再说，知县到底是正印官；不比盐大使，说起来总是佐杂，又是捐班的佐杂，到处做‘磕头虫’，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。”

“对，对！”小胡不断点头；“那么，这一来，你要多少‘本钱’才够呢？”

“总得五百两银子。”

“噢！”小胡没有再接口，王有龄也不再提，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，小胡不见得会有，就有也不见得肯借。

两人各有心事，吃闷酒无味，天也黑上来了，王有龄推杯告辞，小胡也不留他，只说：“明天下午，我仍旧在这里等你，你来！”

“有事吗？”王有龄微感诧异，“何不此刻就说？”

“我有点小事托你，此刻还没有想停当。还是明天下午再谈。你一定要来，我在这里坐等，不见不散。”

看他如此叮嘱，王有龄也就答应了。到了第二天下午，依约而至，不见小胡的踪影。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，对王有龄来说，是一种浪费；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。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，庙前有耍把戏的，打拳卖膏药的，摆象棋摊的，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；他这里立一会，那面看一看，到红日衔山，方始走向原处，依旧不见小胡。

是“不见不散”的死约会。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，不等是自己失约；要等，天色已暮，晚饭尚无着落，呆了半天，越想越

急，顿一顿足，往山下便走；心中自语：明天见着小胡，非说他几句不可！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，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，何苦捉弄人？

走了不多几步，听见后面有人在叫：“王有龄，王有龄！”

转身一看，正是小胡；手里拿着手巾包，跑得气喘吁吁，满脸是汗。见着了他的面，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，问道：“你怎么这时候才来？”

“我知道你等得久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小胡欣慰地笑着，“总算还好，耽迟不耽错。来，来，坐下来再说。”

王有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一副设在棚下的座头，泡了两碗茶；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地，目送着经过的行人，手里紧捏住那个手巾包。

“小胡！”王有龄忍不住问了：“你说有事托我，快说吧！”

“你打开来看，不要给人看见。”他低声地说；把手巾包递给了王有龄。

他避开行人，悄悄启视，里面是一叠银票，还有些碎银子，约莫有十几两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。”

王有龄楞住了，一下子心里发酸，眼眶发热，尽力忍住眼泪，把手巾包放在桌上，却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
“你最好点一点数。其中有一张三百两的，是京城里‘大德恒’的票子；认票不认人，你要当心失落。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些零碎票子，都是有名的‘字号’，一路上通行无阻。”小胡又说：“如果不为换票子，我早就来了。”

这时王有龄才想出来一句话：“小胡，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”

“朋友嘛！”小胡答道，“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，英雄末路，心里说不出的难过，一定要拉你一把，才睡得着觉。”

“唉！”王有龄毕竟忍不住了，两行热泪，牵连不断。

“何必，何必？这不是大丈夫气概！”

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，也是很好的激励；王有龄收拾涕泪，定一定神，才想起一件事，相交至今，受人绝大的恩惠，却是对他的名氏、身世，一无所知，岂不荒唐？

于是他微有窘色地问道：“小胡，还没有请教台甫？”

“我叫胡光墉，字雪岩，你呢，你的大号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雪轩。”

“雪轩、雪岩！”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，抚掌笑道：“好极了，声音很近——好象一个人。你叫我雪岩，我叫你雪轩。”

“是，是！雪岩，我还要请教你，府上——？”

这是问他的家世，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：“守一点薄产过日子，没有什么谈头。雪轩，我问你，你几时动身？”

“我不敢耽搁。把舍间略略安排一番，总在三、五日内就动身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年底就可以回来。雪岩，我一定要走路子，分发到浙江来；你我弟兄好在一起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胡雪岩的“好极了”，已成口头禅，“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，我给你饯行。”

“我一定来。”

到了第三天，王有龄午饭刚过，就来赴约。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，亮纱马褂，手里拿一柄“舒莲记”有名的“杭扇”，泡着茶等，等到天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，寻亦没处寻，只好再等。

天气热了，城隍山上品茗纳凉的，络绎不绝；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，把脖子都摆得酸了，就是盼不着胡雪岩。

夜深客散，茶店收摊子，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。他已经雇好了船，无法不走；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，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。

在王有龄北上不久，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；巡抚常大淳调湖北；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，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——通称“藩司”，老百姓尊称为“藩台”的旗人椿寿署理。

黄宗汉字寿臣，福建晋江人。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，这一榜人才济济，科运甚隆，那年——咸丰二年，当到巡抚的就有三个，广东叶名琛、江西张芾，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、吕贤基、彭蕴章、罗惇衍，还有杭州的许乃钊；与他老兄许乃普，都当内阁学士。

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，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，批评极坏。到任以后，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；椿寿没有卖他的帐，于是多事了。

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。因为海禁已开，而且河道湮淤，加以洪杨的战乱；所以江苏的苏、松、太各属改用海运；浙江则是试办，椿寿既为藩司，又署理巡抚，责无旁贷，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。

漕运的漕，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。多少年来都是河运——先是黄河，后来是运河；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，直到康熙年间，治河名臣靳辅，于成龙先后开“中河”，历时千余年的运河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这条南起杭州，北抵京师，流经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北四省，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，为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；不幸的是，黄河的情况，越来越坏，有些地方，河底淤积，高过人家屋脊，全靠两面堤防约束，“春水船如天上行”，真

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。而运河受黄河的累，在嘉庆末年，几乎也成了“绝症”。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。

在嘉庆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，著有一篇“海运南漕议”，条分缕析，断言“一举而众善备”；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。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，由安徽巡抚调江苏，锐意革新，消除盐、漕两事的积弊，齐彦槐的建议，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。

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，在上海设立“海运总局”，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“沙船”一千艘；名为“三不象”的海船几十艘，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，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，省时省费，米质受损极微。承运的船商，运漕而北，回程运豆——一向漕船南下“回空”；海船北上“回空”，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，而且出力的船商，还“赏给顶戴”做了官，真正是皆大欢喜。

但是到了第二年，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！依然恢复河运。因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，他们不愿意革新。

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，征粮的权属于州县；这七品的正印官，特称为“大老爷”，在任两件大事：刑名、钱谷。延请“绍兴师爷”至少亦得两名：“刑名师爷”和“钱谷师爷”。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，都靠这两个人。

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，在于能了解情况，善于应付几种人，第一种是书办，世代相传，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，哪有多少田，该纳粮多少？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，为不传之秘。

第二种是“特殊人物”，他们所纳的粮，都有专门名称，做过官的绅士人家是“衿米”；举人、秀才、监生是“料米”，这两种米

不能多收，该多少就多少，否则便有麻烦。再有一种名为“讼米”，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，也要当心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刁恶霸道，不易对付的那班“特殊人物”，必须敷衍，分量不足，米色粗劣，亦得照收不误。甚至虚给“粮串”——纳粮的凭证，买得个安静二字。

有人占便宜，当然有人吃亏；各种剥削耗费，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，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，这叫做“浮收”，最“黑”的地方，“浮收”到正额的一半以上，该纳一石米的，起码要纳一石五斗，于是有所谓“包户”，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，或者能挟制官吏；小户要托他们“包缴”，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，便宜得多。

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。漕船都是官船，额定数字过万，实际仅六千余艘，分驻运河各地；一地称为一帮；这就是游侠组织“青帮”之帮的出典。

帮中的管事及水手，都称为帮丁，其中又有屯丁、旗丁、尖丁之分；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，连护漕的千总、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。州县衙门开仓征粮，粮户缴纳；漕船开到，验收装船，名为“受兑”。一面征粮，一面受兑，川流不息，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；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。

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“看米色”。由于漕船过淮安时，漕运总督要“盘粮”点数；到通州起岸入仓时，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，如有不符，都由漕船负责，因此，他们在受兑时，验看米色。原是分所当为。但米色好坏，仅凭目视，并无标准，这样就可以挑剔了，一廩一廩看过去，不是说米色太杂，就是不够干燥，不肯受兑。

以一般的情况而言，开仓十日，所有的仓廩就都装满了，此时如不疏运上船，则后来的粮户，无仓可以贮米，势必停征；

粮户也就要等待。一天两天还不要紧，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，日子一久，废时失业，还要贴上盘缠，自然非吵不可，这叫做“闹漕”，是件极严重的事，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。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，这一闹漕说不定就会激起民变，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。

因此，钱谷师爷，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“看米色”的旗丁讲斤头；倘或讲不下来，而督运的委员，怕误了限期，催令启程。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，只管自己开船；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，必须设法自运漕米，一路赶上去补足，称为“随帮交兑”。

幸而取得妥协，漕米兑竣，应该出给名为“通关”的收据，这时尖丁出面了，先议“私费”，就是他个人的“好处”；私费议妥，再议“通帮公费”，是全帮的好处。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，以及尖丁私费、通帮公费，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由浮收来支付。

这以后，就该帮丁受勒索了。首先是“过淮”投文过堂，照例有各种陋规；一帮船总要花到五、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。这一关一过，沿路过闸过坝，处处要送红包，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。最后到了通州，花样更多，要投四个衙门的文，有人专门代办，每船十三两银子，十两铺排四个衙门，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。等漕米上岸入仓，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，总要花到三、五十两。所以帮丁勒索州县，无非悖入悖出。

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，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；在运河里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，以及木排，千万要当心，那是在运河里蛮不讲理出了名的，撞沉了漕船，他们可以逃散，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。因为如此，帮丁便格外团结，以求自保；“青帮”之起因如此，所以，他们的“海底”名为“通漕”——并不是

世俗所称的“通草”。

一度行之有效，但以积习已深，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，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；这出于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人，第二个是地。

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，湖北人，极能干，而且善于结交，所以公卿延誉，负一时物望。他颇有意步武陶澍，留一番政绩。陶澍改盐法，淮北行之大效，而淮南依旧，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；漕运也是如此，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，准备恢复海运。

适逢其会的是，运河出了问题，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，“全河北趋，由沛县之华山、戚山分注微山、昭阳等湖，挟清水外泛，运河闸、坝、牵堤，均已漫淹”，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，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。

海运之议，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、江苏巡抚杨文定、浙江巡抚常大淳，会同筹划。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漕米，改用海运。浙江则是试办，但其间又有反复，未成定议。

就在这段期间中，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；当朝命初下时，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，通称“臬司”，等椿寿到任时，他已经调差了。等二年，洪军由广西而湖南；湖北吃紧，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，调为湖北巡抚。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。

椿寿的运气太坏。这年的浙江，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，自五月以后，雨量稀少，旱荒已成；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，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，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，影响漕运。

江苏的海运，非常顺利，四府一州的漕粮，糙米三十二万多石，白米二万七千余石，于三月间出海北上，安然运到。而